

后 记

富永正三

(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会长)

《三光》是在社会上遇到不幸命运的一本书。

距今27年前，由光文社神吉晴夫先生出版了一册精装本的《三光》，立刻成为畅销书，但是马上受到右翼的破坏，在市面上看不到了。1982年夏天，森村诚一先生写的《恶魔的饱食》出版，轰动一时，与此并列的新编《三光》第一集和第二集也同时计划在光文社出版。后来，新编《三光》第一集出版，再次成为畅销书。

但是不久，发生了《恶魔的饱食》的照片误用问题。大致在同一时期，新编《三光》上发表的照片中有一张被指明“有错误”。乘此机会，右翼势力又猛烈攻击，新编《三光》第一集只好从市场上收回。此时，第二集虽然已经完成了第二校，但因上述事件而终未得见天日。

此后经过曲折，由于森村诚一先生的努力与晚声社和多田进先生的决心，汇编第一集和第二集，作为全版的《三光》，才第三次又出版发行了。我们的手记冠以《三光》之名问世，一想到这恐怕是最后一次的时候，不禁有些感慨。

关于“为什么现在出版《三光》”的问题，如同本多胜一先生在“前言”中所说的那样，是因为现在让我们走错误道路的情况又一次严重起来。

在这里收录的手记，是我们对战争体验的很小的一部分。我们自满洲事变——关东军用自己的手炸毁铁路，捏造是中国军队干的，日本战败后才弄明白其中原委，由此却发展到卢沟桥事变、太平洋战争——开始，在没有道义的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中，反复干着非人道的野蛮行为。这是侵略战争的实际状况，如同森村诚一先生的“前言”中所详述的那样，我们也没有特别例外。当然，虽说是这样写了，但并不是说对我们当时的野蛮行为有稍许请求免罪的意思。

1950年，我们作为对中国有罪的战犯，由苏联引渡到中国，我们认为必定要受到残酷的报复，恐怕不能活着回去了，就在这种自暴自弃的心情下，对中国方面接连采取反抗的态度。但是中国人民的战犯管理所的职员，和我们所想象的相反，对我们一点儿也不采取复仇的态度，一次也没有使用过侮辱性言词。他们严格遵守中国中央政府对待战犯的政策：“恨其罪而不恨其人”。尽管职员一天只吃两顿饭，而作为战犯的我们，一天却吃三顿饭。一旦有人生病，便精心救护，重病号送到外面医院住院治疗。起初，我们对中国方面这样的态度产生怀疑，但是连续一两年后，我们明白了：人和人的关系本来就应该这样的。过去，我们拿中国人不当人，而是当作蝼蚁之类来看待，这是错误的，我们重新认识了自己的过去。

过去，我们把自己干的野蛮行为总说是“长官（上司）的命令”。现在，把自己的罪行合理化和为自己辩护的思想已转变为从被害者的立场来考虑了，懂得了无论长官的命令还是本人的意志，区别不大，因为总归是自己干的，使别人受害。

就这样，我们的认识逐步加深。尽管有着程度上的差

别，但当时我们都认为，无论受到怎样的处罚都是理所当然的。在这个阶段（1955年前后），本书收录的手记就写出来了。在对自己的过去认为应当判罪的激昂情绪中，所写的手记不可否认有极度强调自己罪恶的倾向。但是，所写的内容是事实，在各篇手记后面附加笔者目前的感想，这一点就清楚了。

1956年春设立军事法庭，在千百名战犯中，45名被起诉（其中9名是太原组），其他不起诉，即日释放，在1956年回国。被起诉的监禁12—20年（苏联5年，中国6年，合计11年，都算入刑期）。判刑的人，到1964年为止，最后3名也被释放，全部回国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负责管理我们的职员中有的人参加过抗日战争，还听说职员中有自己或自家人遭受过日本人残酷迫害的受害者。干这些工作的人们，一开始对我们的反抗态度非常生气，甚至有一个看守说：“把这些家伙拉到北满旷野去，都应该杀掉！”

“我们还忍耐着吃两顿饭，倒给他们吃三顿饭，他们还是那样的态度，这是什么事儿呀！”也有这么说着便踢飞饭罐的人。希望调动工作的人也陆续不断。听说所长遵从中央政策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

但是，随着我们态度的转变，职员也对政策的正确性有了自信，勤奋工作，这又在我们当中有了反映。我们接触到这样政府的方针政策，和超越管理人员个人感情之上的高度人道主义精神，才从鬼域回到了人间。

读者诸君如果能够从本书收录的手记中了解到日本人在中国干了些什么，知道战争使人变成鬼，中国人民靠高尚的道义又使我们由鬼域回到人间，则我们深感幸运。

最后，对本书出版时写了前言的本多胜一、同森村诚一两位先生，和承担出版任务的晚声社和多田进先生，以及协助发表手记的各位会员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1984年3月